



《海南岛志》封面。

1925年,在法属东京地区(今越南北部)调查与传教的法国神父萨维纳应国民政府之邀来到海南岛当翻译,并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之托,调查海南岛的民族和语言。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海南各地,调查了海南话、临高话和黎语,并编辑了3部词典:《海南话—法语》、《临高语—法语》和《黎语—法语》。

1928年10月,萨维纳在与时任广东省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黄强一起考察了五指山一带的黎区后,撰写了《海南岛志》。这部长篇论文于当年12月提交给河内地理学会,并于次年作为《河内地理学会丛书》第17册正式出版。此书内容分3部分:海南岛概况,以日志形式记录穿越黎族山区的行程以及黎语—法语对照词汇表,并附有12张照片和一幅萨维纳手绘的海南岛地图。

与萨维纳的其他著作相比,此书篇幅不长,但文笔精炼,内容丰富。关于各地风土、街景、植被的记述,让人印象深刻,如同亲历。对一些事件的记录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十分珍贵,比如书中提到岛上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活动的情况以及当时教堂、寺庙的情况,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书后的黎语词汇表共记录298条词汇(据对比属于方言抱显土语),采用越南语中的拉丁字母系统拼写和标注,不仅标注了声母和韵母,也标注了声调,这在传教士的海南岛语言研究著作中绝无仅有,因而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此书比德国人史图博于1937年出版的《海南岛黎族志》还要早,更显此书价值。

估算出上世纪20年代海南岛的人口与民族

由于条件所限,关于海南岛的人口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并不十分清楚,好多数据都是凭想象估计出来的,缺乏调查依据。就连1926年新成立的海口市的人口,当时的市长都不清楚,而萨维纳却在官方调查数据出来之前,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大体合理的人口数字。比如他估计当时海口(含郊区,不包括府城)约有6万人。关于全岛人口,他说:“在全岛各个方向都跑遍以后,我相信把人口估计为200万或者顶多250万,也就是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60人,不会有差错。”这与某些人估计的六七百万的数字相差甚远。

萨维纳对于当时讲不同语言的民族的人口估计为:讲海南话的人(他叫福佬人)150万;讲临高话的人(他叫村人)40万;黎族人20万;苗族人(他叫倭人)5000至6000;讲南岛语言的回黎人(他叫马来人)4000人;客家人与讲军话的人数目不详,但人口不多。讲儋州话的人他没有提及,可能是把他们归入黎族了。

据陈铭枢等人于1930年完成的《海南岛志》记载,1928年广东省南区善后公署清查海南岛人口为219万(黎苗俾杞除外),海口市人口为45454人,又说“黎境占全岛半数,丁口不下30万”。萨维纳给出的数字可以与此互相参证。

关于海南岛的民族,海南地方志历来辗转抄袭,将听不懂其语言的民族统称为黎族,仅有“生黎”、“熟黎”之别,但后者内容非常宽泛。所谓的“琼山黎”、“临高黎”、“儋州黎”可能根本不是黎族。对“苗人”的称呼也是张冠李戴。萨维纳是已知第一个从语言学角度把临高人从“黎人”这个概念中区分出来并准确定位的人,也是第一个把海南苗族确定为勉人的人。萨维纳在到海南岛之前,曾长期居住在越南北部台人、苗人、依人和倭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能用台人的语言跟临高人沟通,也能用粤语跟海南的“苗人”交谈。

海口兴起,成为当时全岛最重要的港口

海口原属琼山县,1926年建市(县级),设市政厅。萨维纳在海南岛时,海口市刚建立不久,但由于地理之便,已成为全岛的经济中心。邻近的琼山府城虽依然是全岛首府,却已经破败落后。萨维纳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的海口与府城:

“琼州或琼山……现在依然是全岛的首府……但却全然破旧,到处被虫子蛀过,一旦倒下成为废墟,再也站立不起来。海口这座位于金江口的城市,是现今岛上真正的首府。

“海口城作为全岛的骄傲,不停地改变,不断地美化。它现今有了邮局、电报局、电话、电力、无线电报、飞机、自来水井,大马路两旁有最时髦的商铺和旅馆,街上车水马龙。它与琼州旧城以及北部各地有定点班车的相通,这些班车日益取代那些顶着热风、骨瘦如柴的车夫们,以及那些传说中才有的人力车。

“(海口)城内狭窄的小巷在一天天消失,让位于新的林荫大道。老旧的烟熏黑的小店铺,被拔地而起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大型货仓取代,里面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尤其是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货物。法国仅向这里出口精品红酒、各种烈酒和香槟,这些酒在所有的新式酒店里都有充足的供应。

“从印度支那和东京(指越南北部)来的船几乎只运送大米和水泥,这些水泥是中国日益增多的新建筑所需要的,并与暹罗产的水泥相互竞争。

“昔日的首府琼州如今在它的现代邻居面前,已经彻底黯然失色,后者以前只不过是它的一个不起眼的外港,而且多少可以说是走私犯、海盜与贼船的窝。”

海口港是当时全岛最重要的港口,有船通往香港、广州以及越南的海防等地,前往泰国曼谷、新加坡和荷属印度(今印尼)的苦力也多从这里出发。海口港为全岛提供各种的生活必需品,也把海南的产品运往外去,认识那个已远离人们视线千年的古王朝。象雄默默地隐身于阿里的神山圣水间,冷俊的冈仁波齐,碧透的玛旁雍错,令人叹为观止的土林、

1928年,他在52岁时首次穿越当时连汉族人都感到陌生的黎族聚居区,凭着坚韧和勤奋,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有关当时海南岛地理人文的珍贵记录——

法国人萨维纳和他笔下的海南岛

□ 辛世彪

西方人第一次深入黎族聚居区的记录

萨维纳在海南岛期间最得意的就是1928年10月间的穿越中部山区之行,因为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深入到黎区内部。1882年,美国长老会牧师香便文和冶基善曾试图穿越黎区,但因受人蒙骗,无功而返。萨维纳对黎区之行很感兴趣,他做好了各种准备,包括鞋、线、小刀、剪刀以及赠送给黎族人的小礼品,并专门为此学习了黎语。1928年10月,萨维纳与黄强一道,在150名士兵的陪同下,从海口出发,经定安、屯昌到琼中,再到五指山下的水满村,然后经南圣、保亭到陵水,从现在的新村港乘船到达文昌的清澜港,最后乘汽车返回海口。他们历时20天,历尽千辛万苦,随行的几个士兵甚至因为疲劳过度,回来后不久就死亡了。

黄强之所以会不畏艰险深入黎区,是因为他想修建一条铁路,这次远行等于实地勘探。萨维纳边走边记录沿途的地貌植被、风土人情,测量山体高度,探究水系源头,并且拍照,礼拜日还不忘做弥撒。

1928年10月11日,萨维纳一行分乘14辆汽车从府城出发,沿着金江向定安进发,经过一个新建的空军营地后到达龙塘镇。次日到南吕,然后步行向岭门前进,这是汉区与黎区的交界地。在岭门,他们遇到了早期天主教徒的后代;在一个叫荔枝塘的黎村,他们目睹了黎族人的生活:“只有饱尝过人世间的苦难,才能忍受在这里安身……人穷得像老鼠,拿不出任何东西给我们。就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用杵舂米。”

但是在百花岭附近的另一个黎村,他们见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士兵们看到黎族妇女的艳丽服饰就轰然大笑起来。额上方(系)一条绣花头帕,(身穿)一件及腰襟衣,前面绣着双排金线,袖子镶着红边,(下穿)一条整个都绣花的短裙,长仅及膝盖,窄得让她们只能迈小步,两个膝盖还要相碰,要登高或跨越,就得双脚跳。如此不方便的式样,已经流传数千年之久。”

萨维纳描述了他看到的黎族民居:“这里黎族的所有房屋通常都还有一个门,就是一个小后门,与正门相对,但隐藏在一堵隔墙后面。房子里的3间屋子,都靠一个狭小昏暗的过道跟这个门相通。而在船形屋式民居里,这个门却是开在房顶上,从屋外是看不见的。这是个安全门,遇到攻击时,由此可以逃到树林里。”

关于山区的动植物,萨维纳写道:“快到山跟前时,植被也变了。椰树、槟榔树、竹子被栗树、乔木和鱼尾葵取代。河边大树的树枝上吊着兰科植物。这一地区鹿鹿多。山谷底部黎人的狭小稻田以及山坡上慢人的田垄,都用白木做的坚固栅栏围起来,以防动物践踏。也有很多公熊和野猪,但是老虎和豹子全岛都没有看见过。”

1928年10月20日,他们来到五指山下的水满村,萨维纳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个村至少有120户人家,都是黎族。这是全岛最美的村子,位于海拔1000米处,旁边是崖州河浇灌的宽阔稻田以及五指山高耸的山峰。”就在这里,萨维纳看到了黎族妇女的纹面。他白天测量周围地形的高度,寻找万宁河与昌化江的源头,晚上则作民俗调查:“这一夜我专心研究黎人的信仰。村里所有的妇女彻夜为士兵们舂米。”

他记录了黎族纹面的来历。他写到:“我住在这些土著人中间,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传说对他们的影响。例如他们把房子建成船形,是为了纪念神话中的那条船;女人们依然纹面,是为了纪念公主的纹面;她们头戴发饰、衣服绣花,是为了纪念公主的发饰和装束;女人守寡以后必须回娘家住,以便能够再嫁,还是为了纪念公主想回她父亲家。”

萨维纳还调查了黎族人生育、死亡和婚姻的风俗:“比如黎人总是在灶房里生孩子;有病不求医,总是把巫婆请到病人床前;丧葬时宰牛狂欢,从不上坟;还有结婚7天后新人分开,新娘只有等到怀了孕才能正式成为女主人。10月23日行路时看到一个死人头,插在路边的一截木桩上,当地人黎人:‘那是一个偷牛贼的人头,我们这儿偷东西要杀头的!’”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南胜(一名大旗)一个黎族头人家里,萨维纳这样描述这件事:“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美国新教牧师以前在府城时的学生,会说英语。他有两个妻子,也都是基督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脖子上和手腕上佩戴护身符。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挥舞连枷打稻子。天黑时,另一大群苦工扛着木柴回来。黄将军对我说,这个封建主不老实,他以前曾跟着共产党走。不管他是真的共产党还是看起来像共产党,我得承认,由于他家的优越条件,我们受到隆重的接待。”

接下来,经过几天的劳顿跋涉,他们终于来到陵水县城。10月29日,萨维纳一行在陵水新村港登上一艘小汽船,在港内大帆船船上船民们的齐声鸣枪中离开,夜里11点到达文昌的清澜港,次日乘汽车到达海口,结束了这次历时20天的长途跋涉。

萨维纳在《海南岛志》一书的结尾感谢黄强一路对他的体贴照顾,也感谢那些给他留下美好记忆的可爱军人。而我们也感谢萨维纳,在他52岁时首次穿越连汉族人都感到陌生的黎区,凭他的坚韧和勤奋,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有关当时海南岛地理人文的珍贵记录。

远,人们只能乘坐可以通行的舢板从金江河湾上岸,这些舢板也得等待涨潮落来出入。在这种情形下,上船下船是非常受罪的,那些划舢板的汉人还不时借机肆意敲诈。有一次他们强迫我付了15印度支那元才将我送上送到码头,差不多每公里3块钱!”

根据萨维纳的这段记录,当时的船只只能停泊在海口湾外的大海上,然后换乘人力舢板,沿海甸河到长堤路、博爱北、中山路、得胜沙一带上岸。现今中山路一带的百岁老人也回忆说,20世纪早期,海口港的码头不在秀英,而在中山路一带。这一带也正好是旧商铺聚集区,至今仍有许多法式建筑。当时海口的中山路、博爱路、水巷口、海甸岛一带有许多苦力,专做码头搬运和舢板运输。

萨维纳又写到,当时这个通行不便的难题如何解决曾多次被讨论,但是从未有付诸实施。人们也曾设想用15年的时间,在铺前的海湾建一座新港,铺前也面向琼州海峡,在海口以东15公里处。这些方案是由外国专家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制定的,但并没有付诸实施。萨维纳所记载的这些史实都可以与陈铭枢《海南岛志》中的附录《建筑海口港计划》所提供的材料相印证。

几个区域经济中心各具特点

上世纪20年代的海南岛,除了海口市,比较重要的地区经济中心应该是嘉积和文城。萨维纳描述了这两个城市,并勾勒了文昌人的特点:

“海南岛仅次于海口的一个重要城市叫嘉积,属于乐会县,因经流的河而得名,距离该河海口15公里。嘉积城有定点班车通往北部与西北部的海口、定安、文昌以及南部的万宁,把它们连接起来。此外,大型帆船可以逆流而上到达嘉积,使它成为成梯级分布在东部和南部沿海一带的居民,提供从海口用汽车运来的各种货物。嘉积往海口运的是大米、椰子、咸鱼、槟榔以及海南岛南部特产海盐。

“在船运方面,位于北部80多公里外文昌河口处的清澜港与嘉积展开竞争。文城是岛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商埠,是文昌县城所在地。文昌人以贪财、爱闹事闻名全岛,也极善经商。海口的那些最大的货仓都归文昌人所有。在本地经商不能满足,他们就自愿移居国外。每年有2.5万到3万海南人离岛,其中有2万人是文昌人。他们喜欢去的地方是曼谷和新加坡……在越南西贡也有很多文昌人,靠做厨师出名。”

萨维纳描述的定城是一个北部与中南部之间的货物交换地,因为有靠近金江(南渡江)的有利位置而变得重要,金江也变得极为繁忙:“定城用舢板向海口运送各种牲畜以及周边地区的各种土产。牲畜大多来自中部山区,经由海口运往香港。金江是目前岛上最繁忙的河流,一年到头,江面上总是有各种帆船上下穿梭。这些船每次总是四五艘一组或10至15艘一组结伴出行,这样就能抵挡经常出没的海盗的攻击。到了晚上就在江心并排抛锚,以免遭袭击。”

萨维纳还描述临城有定点班车与海口连通,当时人们在修路,以便把班车延伸到盐场和西海岸的港口。

萨维纳没有专门描述万宁的情况,重点介绍了陵水和崖州这两个他熟悉的地方。他介绍了陵水的港口、陵水河口以及当地共产党活动的情况,特别提到陵水的椰子工艺品:“运往海口那边的椰子在陵城进行精细的加工。海口人用椰子做的酒具、茶具、咖啡用具,现在整个远东地区都已熟知了。在上次的河内博览会上人们可以看到样品,它们的展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关于三亚,萨维纳费了不少笔墨,介绍了这里的铁矿、榆林港里的珊瑚层、三亚的珊瑚石建筑。他还介绍了三亚的海滩,认为有耀眼的白沙是全岛最美的。并介绍南部沙滩之所以是白色的,是因为这些细沙来自贝壳动物以及各样珊瑚碎片,因此白得耀眼。当时的三亚有两个港口,分别是榆林港和三亚港,后者是渔港,但前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萨维纳援引黄强的话:“在榆林港建一座海军基地,再加上西沙群岛的支撑,就不仅能控制东京湾,还能控制马尼拉湾,让所有从欧洲前往香港和日本的船只俯首听命。”

接下来萨维纳介绍了南部的崖城、莺歌镇(今莺歌海)、感恩和儋州的几个港口,岛北的火山口、玄武岩和红土以及各处的植被、果木等。



1920年代的海南岛地图。



黎族人的房屋。

一次偶然的机缘,听金书波提起关于象雄文明的断想,原以为不过是他一时的冲动。4年过去了,当崭新的、装帧雅致的《从象雄走来》摆在眼前时,不禁感到惊讶。迫不及待地捧读这本诗情画意的著作,心中充满对作者的敬佩,禁不住赞叹金书波果然是位言行相顾者,在繁杂的工作之余著成此书,实属不易。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作者竟然有如此细腻的观察和笔触,将古老象雄王朝的一个个传说与眼前的文物遗存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人们结缀出一幅象雄文明的画面,引领读者在震撼中穿越千年。

从未去过阿里,在笔者心目中,阿里是一个极具诗意的地方,没想到,阿里还是象雄文明的中心。

跟着作者优美的语句、丰富的想像和清晰的图片,向千年象雄走去,认识那个已远离人们视线千年的古王朝。象雄默默地隐身于阿里的神山圣水间,冷俊的冈仁波齐,碧透的玛旁雍错,令人叹为观止的土林、

动人的萨玛嘎故事,都是今人走向象雄途中拾得的珍珠宝玉。

随着作者寻找的脚步,象雄就这样越来越近了。古老的岩画,向今人讲述着象雄人的生活场景;佛战胜苯之后,以为苯已远离人们的生活,却发现苯依然深隐于藏族居民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正在确认中的穹隆银城以磅礴的气势告诉人们象雄昔日的辉煌,也将象雄那个古老的神话具体化,使人们有了追问这沉默的古城址的冲动,象雄——一个曾经威仪高原的王朝为何突然消失?古如加木寺里收藏的铭文锦和金面具,为人们呈现出汉代中原文

化与高原文化之间的联系。作者以专业的术语和知识分析了锦、锦文及其他器物,再次证明了古籍中见诸文字的记载只不过是人们丰富生活的冰山一角,有许多疑问还有待发现。沉默的阿里似乎正在等待人们发现象雄文明及其后文化变迁的历史,说出它曾经的故事。正是跟着作者的脚步,笔者这个从未去过阿里、对藏文化缺少深刻认知的读者,知道了在灿烂丰富的藏族文化遗产中,象雄文明应当有其一席之地。象雄“是与青藏高原的浑厚、博大、包容融为一体的”。毕竟关于象雄的信息在史籍中不过是些“断

简残篇中的只字半语,考古发掘与考试尚待时日”,因此,越是走近象雄或走进象雄,其神秘和博大越是让人心生敬畏,疑问丛生。正如作者所言:“心中的象雄,就如同圣洁的冈仁波齐,你可以匍匐朝拜,但可以凭借现代化设备清晰地拍摄,但却永远无法触摸,更不可能深入它的内心。”

《从象雄走来》算不上是一本严格的学术著作,不论其结构还是行文,均未尊行学术著作应有的规范。然而,作者的问题意识、对关于象雄文明、象雄文明与中原文明关系的种种提问及解答却具有相当的专业

水平,也具有学术特性和启示。著作中也借助了大量史学和考古学工具来深入讨论和象雄有关的问题。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象雄的文献资料,字里行间透出作者的探索精神、对象雄文化的敬畏和颇具特色的深思。图文并茂和深刻的思索是此书引领今人回望象雄千年辉煌的突出特色。

出于对象雄古老文明的崇敬,作者指出象雄遗址保护的缺失,指出有“太多的珍贵文物残存在阿里各处,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侵蚀而无人知晓”的现状,真诚地呼吁要寻找保护的方法和投资,“希望社会各

界人士,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专家学者,或者纷至沓来的游客,都能关注阿里,并尽我们所能保护那里的一切”。只有很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才是对象雄文明“最好的尊重和追思”。

是啊!不能仅仅留恋西藏神奇俊美的山水,还应了解和认知那片大地上曾经孕育的文明,那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奇葩。一个北京人,行走高原上,以那样敬畏的态度和心境,描绘藏地的古老文明,追寻象雄文明的古老踪迹,不是出于一时冲动,也不是出于一时好奇,而是出于对这里的人民和文化的热爱,拿起自己的笔向世人展示象雄文明,也向更多的人提出了心中的希冀。

在炎热的北京,一口气读完《从象雄走来》,享受了一片高原的清凉,对古老的文明有了新认识,对高原有了新的向往。真希望有一天也能匍匐在冈仁波齐脚下,拜倒在穹隆银城,亲耳细听那千古文明的回响。

□ 周竟红